

北京市青年流动人口行为适应比较研究^①

杨菊华 张莹 陈志光

摘要:北京是众多青年流动人口向往和最终落脚之地。他们能否尽早尽快地适应北京市的社会生活折射出北京的政策制度、经济结构、主观态度等多种要素对流动人口的开放、包容与接纳程度。本文整合定量和定性数据,分析、比较了北京市不同年龄、不同户籍流动人口在人际交往、社区参与、闲暇模式等方面的异同。结果表明:青年流动人口行为适应程度低于年长流动人口,多种因素制约着他们有效地参与到北京的社会生活中。

关键词:行为适应 人际交往 社区参与 北京市

数据显示,2011年北京市流动人口约700万人,其中青年人约占36%。虽然就全国的平均水平而言,这个比例并非最高,但由于流动人口基数大,该比例依旧代表了一个庞大的人群,绝对数量约为250万。在进入北京的流动人口大军中,他们是最朝气蓬勃的一股力量,是推动北京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

青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北京后,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都发生了变化,必须在一个全新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情境中经历再社会化的过程,通过人际交往,接触、了解、熟悉并习惯流入地社会及市民的价值观念;通过参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重构生活方式,重建社会网络,重塑行为模式,这就是行为(或社会)适应过程。青年流动人口实现行为适应对提高他们对北京这座城市的认同度、促进纵向社会流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全国的情况看,有关流动人口行为适应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他们的人际交往范围狭小、闲暇活动单调枯燥、社区参与程度很低。但是,既从综合角度又从不同指标专门针对北京市青年流动人口行为适应的研究很少,对其现状、特征和影响因素所知不多。本文利用最新的抽样调查数据和定性访谈资料,系统分析北京市青年流动人口行为适应的现状和特点,深入挖掘影响他们行为适应的潜在机制,提出推进北京市青年流动人口行为适应的初步政策思考与建议。本文的分析结果将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北京的制度性、结构性要素及本地市民对外来人口的接纳和包容程度,透视出北京精神的落实情况和社会管理的创新水平。

一、流动人口行为适应现状与特点

简而言之,行为适应是指流动人口在行为上是否适应了流入地的生活,是社会融入的一个重要维度,在国际移民研究中广为使用(杨菊华,2009;2010)。对青年流动人口而言,人际交往、社区参与、休闲方式等都是行为适应的重要考量指标。

(一) 人际交往

人际交往是人类特有的存在维度和活动方式,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社会关系的一种中介,是以物质交往为基础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交往的总和。人口流动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受制于流动者的社会资本及社会网络(Portes,1998:1-24);与谁交往、交往频度、交往模式、交往范围等构成社会

^① 本研究得到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近30年北京市青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变动趋势研究”(项目批准号:11SHA004)和国家社科基金“农民工家庭的融入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0BRK013)的资助。

作者感谢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允许使用2011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网络的基本成份与内涵,也是行为适应的重要指标。研究表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网络呈现出从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特点向基于业缘的网络扩展趋势,但户籍制度造成的农民工缺乏“身份认同”、城市市民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以及社会支持的严重不足,限制了其网络的拓展,影响了社会资本的数量、质量与结构(刘传江等,2009)。因此,其社会交往呈现出内倾性和表层性的特征:网络规模小、紧密度高、趋同性强、异质性低。尽管在某些省份(如:浙江省),大多数流动人口认为跟城市居民交往密切,但市民却认为与农民工接触很少(钱文荣、张忠明,2006)。不过,总的特点中也存在人群差别。比如,30岁以上(杜鹃等,2008;魏晨,2007)、女性(蒋美华、王国艳,2009)、少数民族(陈云,2008)、在婚(李树苗等,2008)农民工与本地市民交往的比例分别低于30岁以下、男性、汉族和不在婚者;又如,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农民工更可能与流入地市民交往、在城市发展(杜鹃等,2008;李树苗等,2008)。大量研究表明,很少青年流动人口经常与流入地本地市民主动交往;新生代农民工(王春光,2001;任娟娟,2012;穆薇等,2012)更是延续着第一代农民工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以聚群方式为主,重视群内来往,缺少群际交流(王春光,2010)。对于北京市青年流动人口而言,虽然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与北京市民交往的比例相对较高,但交往的深度和广度比较有限(郭星华、邢朝国,2009)。

(二) 社区参与

社会学理论将社区区分为空间和非空间社区两类。前者具有相对明确的地理和位置范围,以共同的居住地及对周围财产的共同所有权为基础,属真实社区,是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生活的落脚点及居住、交往的空间场域;后者则强调人际交往、联系和互动,以及在这些交往中所产生的情感联结(Cohen,1996;Lyon,1987),属虚拟社区。研究表明,流动人口未能真正进入社区生活。从空间上看,他们形成自己的、以产业和地缘为基础的“准社区”,如北京市的“浙江村”、“河南村”、“新疆村”,即在城郊接合部或城中村形成的同乡聚居地。即便进入城市社区,亦未能有效地参与社区生活、融入社区之中,与本地市民形成心理上和空间上均相隔离的“二元”社区,故而真正参与过公共事务的比例仅约为10%(杨永、朱春雷,2007),在各级各种权利机构中代表的绝对数量很少、相对比例很低(吴祁,2010),政治参与几乎缺失。作为一种“扩大的”社区参与,流动人口参与公益活动的比例也很低。与父辈流动人口一样,青年流动人口很少参加当地社区的集体活动,绝大多数没有参与任何组织(李伟东,2009);虽然其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参与能力不断提高,但因参与途径的缺失和参与制度的制约,政治参与亦难实现(左珂、何绍辉,2011)。因此,尽管青年流动人口很愿意成为城市居民,愿意积极参加社区活动,但因工作忙、流动性大、特别是得不到流入地社会的积极回应,故而影响他们的社区参与(王春光,2010)。在北京市,与市民待遇的不平等和制度上的隔离,使青年流动人口逐渐被边缘化,阻隔了他们与市民的深入交往,参与社区活动和社区组织的比例都较低(郭星华、邢朝国,2009)。

(三) 休闲活动

休闲生活可以从闲暇时间和休闲方式两个角度进行考察。流动人口的闲暇活动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时间短。比如,建筑工平均每天大约只有3小时的闲暇时间(郭星华、胡文嵩,2006),上海闵行区流动人口平均每天的闲暇时间也仅为4.7小时(孟庆洁、乔观民,2010)。二是活动单一。农民工很少涉足城市丰富的闲暇生活,主要还是群体内部娱乐或自我消磨空闲时光(郭星华、胡文嵩,2006),如看电视、听广播等(孟庆洁、乔观民,2010)。可见,虽然与农民相比,流动人口的休闲活动更具多样化,但他们总体上依旧过着单调、贫乏的闲暇生活(孟庆洁、乔观民,2010)，“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不过,与老生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崇尚个性,寻求合乎自己兴趣的生活(梁宇,2007),听音乐、上网、看电影(魏晨,2007),业余活动更丰富多彩,更贴近城市的休闲方式(金萍,2010)。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亦不乐观:绝大多数人没有参加社区或其他主体组织的文体活动、社会公益慈善或社团活动。尽管他们来到北京,精神文化生活无疑会打上一些城市烙印,但对首都文化设施和生活享受甚少,生活圈子狭窄、生活方式单调。

二、流动人口行为适应的理论假设

通过上述简要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现存关于全国或北京市青年流动人口行为适应的研究存在一些局限,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分析探讨。本文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借助具有代表性的调查数据,结合深度访谈资料,从以下几个方面尝试推进现存研究。

其一,关注行为适应的分层性。如文献回顾所示,现存研究仅仅关注农民工,忽视了城-城流动人口。笔者在其他有关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研究文献中多次提到,城-城流动人口和乡-城流动人口虽然同属外来人,但在流动之前,制度性的隔离使他们生活在城、乡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而与这两个世界密切相关的是个体人力资本积淀的差别和在流入地生存发展能力的差距。制度性要素造成了人群之间最深刻的社会分层。这样的分层反过来制约不同户籍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社会的融入期待、生存发展能力、与本地市民交流沟通能力和社区参与的资本,由此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参与模式。因此,在探讨流动人口的行为适应时,既不能将不同户籍之人混为一谈,也不能只考虑“农民工”:前者可能模糊人群差异,得不出接近客观实际的真实结论;后者则无法考察户籍制度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区分(青年)流动人口的户籍类型,并认为:

假设1:与(青年)城-城流动人口相比,(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行为适应状况显著偏低。

其二,关注行为适应的朋辈性。现存研究仅比较青年乡-城流动人口与年长乡-城流动人口。由于时期效应,他们出生和成长在完全不同的宏观社会背景和家庭环境之中,整体知识结构、意识形态、行为模式、对社会的预期等都会不同,从而影响到不同年龄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融入预期和实际参与行为。但是,不同户籍的青年人、年长者各自分别生活在相同时代,他们之间是否呈现出更多的共性?本文区分适应的朋辈特性。基于前述研究,我们认为:

假设2:与年长流动人口相比,青年流动人口在行为模式上表现出更多样化的特点,且适应程度超过年长流动人口;同时,同辈人之间可能有着更多的共性。

其三,关注适应的主观性。除结构性、制度性和时代性等客观要素外,行为适应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制于主观要素,如流动人口的融入意愿和本地人的接纳态度。若无融入意愿,哪怕在流入地居住多年,流动人口也会把自己当成过客,把流入地看做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不会主动适应流入地的生活,反之亦然。同时,融入适应是双向的,除流动人口的意愿外,也需要本地市民的包容和接纳。流动人口来自异乡他地,在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上无疑会与本地人有所不同;且大部分流动人口来自乡村,生活环境颇为不同,流出地司空见惯的某些行为却可能与城市生活和城市文明发生矛盾、冲突。若用回避、歧视、排斥、甚至侮辱的态度对待流动人口的某些不良生活习惯(而非善意地帮助他们纠正),故意拉大与他们的空间与心理距离,无疑会挫伤他们的参与意愿和参与行为。因此,

假设3:(青年)流动人口的强烈融入意愿促进行为适应;而北京本地人的排斥态度阻碍他们的行为适应。

其四,关注适应的过程性。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的时间越长,对当地的各种社会生活习惯越了解,行为方式也越可能接近当地人,更好地适应当地社会,反之亦然。因此,

假设4:(青年)流动人口在北京的居留时间越长,行为适应程度越高。

三、数据与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两个相互补充的数据来源:一是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1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中的北京市流动人口数据,分析、比较北京市青年流动人口与年长流动人口、城-城流动人口与乡-城流动人口行为适应的现状、特点、影响因素;二是利用2011-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人

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在北京等5个地点收集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定性访谈数据,从制度和结构要素、流动人口自身特征、流动特点以及流入地居民的态度等多个方面,分析北京市青年流动人口行为适应的影响机制和路径。此次调查在北京共获得4000个有效样本,分别来自13个样本点。关于定量数据,请参见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编撰的2012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对定性数据的说明详下。

(二) 变量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的行为适应(即因变量)涉及三个方面。(1)人际交往:原始变量有5个选项:户籍人口同乡、流入人口同乡、其他本地人、其他外地人、很少与人来往。在模型分析中,本文将它们合并为二分类变量,将主要与“其他本地人”交往赋值为1,其余分类赋值为0。(2)社区参与:包括社区文娱活动、公益活动、选举和评先进等活动。对于这些参与行为,本文对单个行为分别进行描述,但采用因子分析法,将它们集合为一个综合因子,进行模型分析。这3个成分都高度相关,每个成分的负载均超过0.75,表明进行因子分析是合适的。(3)闲暇活动:包括看电视/电影/录像、下棋/打牌/打麻将、逛街/逛公园、体育活动/锻炼身体、读书/看报/学习、上网/玩电脑游戏、与家人朋友聊天、闲呆/睡觉、做家务、其他。限于篇幅,本文仅对这个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了解北京市不同年龄、不同户籍的流动人口打发闲暇时间的主要模式。

自变量的选择原则是,用于分析的自变量要能很好地检验前面提出的理论假设,故必须重点突出以下几个要素:户籍效应、年龄效应、主观效应、过程效应。为检验户籍效应,本文区分乡-城流动人口(赋值为1),以对应于城-城流动人口(赋值为0);为测量年龄效应,本文将青年流动人口定义为29岁及以下,赋值为1(0表示年长流动人口)。对这两个变量的单独分析结果可直接检验上述前两个理论假设。但是,若要同时考察北京市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行为适应情况,还需要同时考虑年龄、户籍两个要素,故还生成一个二者的复合变量,同时测量不同户籍、年龄流动人口在行为适应方面的异同。变量“融入意愿”和“本地人有偏见”分别被用来检验假定3。前者是个三分类变量,分别表示不想融入、意愿不强、意愿强烈;后者是个二分类变量,1表示流动人口感到本地人不愿接受自己或本地人看不起自己,0表示流动人口感到本地人愿意接受自己或本地人没有看不起自己。适应的过程性衡量为在北京的居留时间(年),用来检验假设4。流入时间是一个五分类变量:1年以下、2-3年、4-5年、6-10年、11年以上。通过控制流动人口在北京的生活时间长短,可更准确地比较青年流动人口和年长流动人口的行为适应程度。

除上述要素外,行为适应可能还受到流动人口的人口学特征和劳动就业特征的影响。为此,本文控制样本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劳动就业特征、居住条件等诸多因素。本文分别将男性、在婚赋值为1,相对于女性、不在婚(分别赋值为0)。受教育程度测量为四分类变量: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及以上。职业测量为二分类变量,将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赋值为1,其他职业类型赋值为0(包括商业服务业人员、个体经商户、农民、普通工人等)。就业身份测量为五分类变量:雇主、自营劳动者、家庭帮工、雇员、无业。就业单位性质测量为四分类变量:个体、私营、国营、其他(包括集体企业、外资企业等性质的单位)。就业方面的变量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居住条件测量为综合性因子,构成成分包括住房内是否有自来水、厕所类型、洗澡设施。我们认为,这些要素都可能影响流动人口的行为适应。

(三) 分析方法与步骤

本文采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使用混合研究方法能够提升构建合适的分析框架、探求因果关系、合理测量变量的能力。借助自然科学所特有的描述性和模型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可从客观上精准把握行为适应这种主观现象,但却难以了解现象背后的本质和机制。定性研究的魅力在于,强调对社会现象的深入了解,尊重实践者对自己行为的解释,描绘一幅幅多姿多彩的画面、讲述数字背后生动鲜活的故事,提供图表中的数字所无法揭示的事理,从而有利于发现

现象背后的本质和促进融入实践的发展,故特别适合用来解释具有主观特点的问题。将二者整合起来,使它们互为补充、互相印证,可有效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既可利用定性研究方法,为定量研究提供理论框架,指导数据的分析过程,并利用定量研究结果检验定性理论的合理性,也可在定量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利用定性资料辨识因果关系,解释数据分析结果的潜在机制和事物关联的途径。本文采用后一种模式。

下面首先描述调查数据,把握北京市不同年龄队列、不同户籍身份流动人口行为适应的现状、特点及影响因素;然后分析访谈资料。对流动人口的访谈,有助于从他们自身的角度来理解他们对行为适应的制度障碍、结构障碍、态度障碍的认识;对北京本地市民的访谈,可考察不同利益群体对相同问题看法的异同、北京本地人对流动人口的看法,并由此判断制度性、结构性、主观性要素作用于流动人口行为适应的潜在机制和路径。这将有效地应对变量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问题和选择性问题的,部分地消除我们对一些因素之间因果关系(如:在流入地的居留时间、本地人的态度、融入意愿)的疑虑。研究结果证实,的确,在流入地居留时间、本地人的态度、融入意愿均为因,而行为适应确是果;而且,制度性、结构性障碍和本地市民的排斥态度的确极大地制约着流动人口的行为适应。但是,不同年龄队列、不同户籍身份的流动人口表现出不一样的参与程度。当然,我们不能完全解决样本的选择性问题——这个问题几乎是所有流动人口研究中都不可避免的。

四、定量数据分析结果

(一) 行为适应的现状

表 1 北京市不同身份流动人口行为适应的现状(单位:%)

行为适应指标	全部样本	城-城流动人口		乡-城流动人口	
		青年	年长	青年	年长
人际交往					
主要交往对象					
户籍人口同乡	25.93	13.76	17.93	28.78	28.89
流入人口同乡	28.40	21.71	18.74	31.41	30.85
其他本地人	18.68	27.83	30.86	13.98	16.05
其他外地人	19.77	29.97	22.46	19.24	17.41
很少与人来往	7.22	6.73	10.02	6.58	6.80
主要与本地人交往	18.68	27.83	30.86	13.98	16.05
社区参与					
文娱活动	33.83	30.58	40.71	29.85	34.71
公益活动	45.30	45.57	53.31	41.28	45.21
选举评优	14.23	12.23	15.83	14.23	14.04
参与因子	29.11	27.40	34.16	26.76	29.28
闲暇活动					
看电视/电影/录像	76.80	66.06	70.60	75.74	81.50
下棋/打牌/打麻将	11.65	3.36	6.79	11.27	15.02
逛街/逛公园	23.65	37.61	26.82	28.37	16.97
体育活动/锻炼身体	13.23	19.88	26.66	11.27	8.81
读书/看报/学习	20.20	31.50	31.83	19.24	14.91
上网/玩电脑游戏	32.38	59.02	41.68	42.68	17.68
与家人朋友聊天	47.80	31.19	35.86	45.15	56.33
闲呆/睡觉	32.55	26.61	21.32	33.22	36.94
做家务	38.88	21.71	35.06	30.84	48.53
样本量	4000	327	619	1216	1838

注:社区参与和闲暇活动都是多选题,故各选项的比例加起来不等于100%。

表1较详细地列出了北京市不同年龄队列、不同户籍身份的流动人口行为适应3个指标的具体分布。就人际交往情况来看,流动人口与流入人口同乡交往的比例最高,但该模式主要见于乡-城流动人口;城-城流动人口则与北京本地市民或不是同乡的其他外地人交往的比例最高。青年流动人口与年长流动人口相比,后者与本地人交往的比例较高,而前者与外地人交往比例较高。

就社区参与的3个指标来看,流动人口参与公益活动的比例最高、参与选举评优活动的比例最低。在区分了户籍身份和年龄后发现,年长流动人口的参与比例高于青年流动人口,城-城流动人口的参与比例高于乡-城流动人口。

就闲暇活动来讲,各类流动人口同样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性:看电视/电影/录像的比例最高。但是,在其他闲暇项目中,不同年龄、不同户籍身份的流动人口却有较大差别。比如,青年城-城流动人口较多逛街和上网,年长城-城流动人口较多上网和做家务,青年乡-城流动人口较多上网和与家人朋友聊天,年长乡-城流动人口较多聊天和做家务,总体而言,青年人更多上网,年长者更多做家务。乡-城流动人口与城-城流动人口相比,前者下棋或闲呆的比例较高,后者进行体育锻炼或读书看报的比例较高。可见,流动人口的闲暇活动虽然有着明显的规律性,但也有与年龄、户籍身份相符合的独特性,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而这与目前研究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

(二) 行为适应与主要自变量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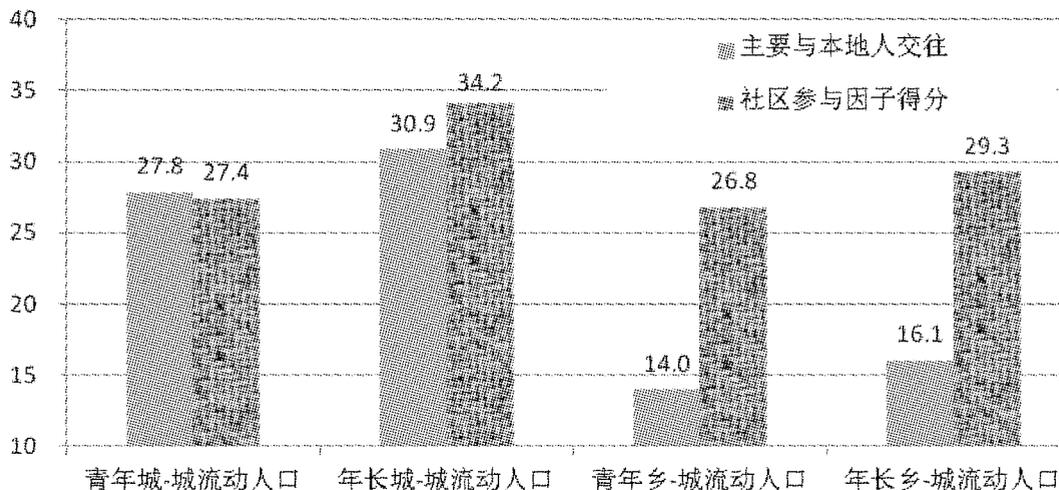


图1 北京市不同年龄、不同户籍流动人口主要交往对象和社区参与相关分析结果

图1描述了四类人群的主要交往对象及社区参与的基本情况,折射出户籍身份、年龄队列与流动人口行为适应的相关关系。总体趋势是,城-城流动人口主要与本地人交往的比例高于乡-城流动人口,而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这一比例又是最低的(仅为14%),次低者为年长乡-城流动人口。从社区参与因子来看,同样也是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参与程度最低,次低者为青年城-城流动人口。由此可见,就交往对象而言,户籍身份差别大于年龄队列差别;而就参与程度而言,年龄队列差别似乎更为明显。

此外,另外3个主要自变量(即流动人口的融入意愿、本地人的态度排斥、在北京的居留时间)和控制变量与主要交往对象、社区参与的相关关系分析结果也都表明,这两个因变量与绝大多数自变量都高度显著相关。限于篇幅,这里未展示相关表格。

不过,虽然相关分析结果揭示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性,但这些关系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或调节。为探讨它们之间的独立关系,下面进行模型分析,检验前文提出的4个理论假设,综合分析青年流动人口在行为适应方面的特点。

(三) 行为适应的影响因素

因变量“主要与本地人交往”为虚拟变量,适于采用 logistic 模型;另一个因变量“社区参与因子”得分为连续变量,可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北京市的动态监测调查在 13 个区县进行;其中,一个区县最少调查 40 个样本,最多调查 1080 个样本,平均约 307 个样本。显然,同一个样本点内的样本具有聚类特性,个体样本套嵌在不同的区县之中,从而使数据具有多层次结构。由于在各样本点之间,流动人口的行为参与可能存在较大差别,而在同一个样本点之内,行为参与可能更为接近,故必须对多层结构的数据特点予以充分考虑。

1. 多层模型

对于多层次结构数据,单一水平的统计模型(如常规的线性回归、逻辑斯蒂回归)具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比如,它放弃了对不同组群之间差异的考虑,使很多原本由分组带来的差异被解释为个体的差异;又如,在多层数据中,同一个高层单位的样本具有较大的关联性和相似性,而这种关联性违反了传统回归模型中的两个基本假定:(1)各组群之间具有方差齐性的性质,(2)随机误差相互独立。因此,常规模型的分析结果可能低估标准误、高估自变量的重要性,从而增加犯 I 类错误的可能性(Goldstein, 1995)。使用多层模型处理具有层次结构的数据,能够纠正由于同一层次内样本的相似性而引起的参数估计误差,改善置信区间和显著性检验,降低犯 I 类错误的可能性(杨菊华, 2012)。

鉴于本文所用数据的多层结构,不能简单地使用常规模型,分别需要使用多层非线性模型。多层模型的基本原理在于,当数据存在不同层级时,它可以将因变量中的变异分解成两部分:一部分归之于同一群体的个体差异;另一部分归之于不同群体之间的个体差异(杨菊华, 2006)。先对低层的变量建立回归方程,然后把该方程中的截距(和斜率)作为因变量,使用高层(第二层)数据中的变量作为自变量,再建立新的方程,从而反映不同层面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杨菊华, 2012)。

本文采用多层模型分析数据,将县(市、区)作为高层单位,受访个体作为低层单位。线性模型和非线性模型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下面以线性模型为例进行简要说明。

首先进行无条件平均模型(即不包含任何自变量的空模型)分析,了解在不同区县,因变量是否显著不同,从而决定是否必须使用多层模型。其方程式为:

$$y_{ij} = \beta_{0j} + \varepsilon_{ij} \quad (1)$$

其中, y_{ij} 代表 j 区县流动人口样本 i 的结果; β_{0j} 代表截距(即平均值);下标 j 表示每个区县拥有各自的截距,是区分多层模型与普通模型的标志。将截距分解为固定成分和区县层次的随机成分,则方程(1)分解为:

$$y_{ij} = \gamma_{00} + \delta_{0j} + \varepsilon_{ij} \quad (2)$$

其中, γ_{00} 代表总均值或总截距,是固定参数; δ_{0j} 代表区县层次的随机变量,是 j 区县的截距到总截距的距离; ε_{ij} 是流动人口个体层次的随机变量,即分布于 j 区县的样本 i 到该区县截距的偏离。正是由于随机变量 δ_{0j} 的存在,该方程式才成为多层模型。

然后,在模型中纳入自变量,探讨个体和群体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在常规模型中,一个模型只有一个截距,而在多层模型中,一个模型包含数个截距,即因变量的截距随群体而异,我们使用随机截距模型进行分析,其方程式为:

$$y_{ij} = (\gamma_{00} + \gamma_{01}G_{1i} + \gamma_{10}x_{1ij}) + (\delta_{0j} + \varepsilon_{ij}) \quad (3)$$

方程式(3)与方程式(2)的不同之处在于,固定效果部分包含了个体和群体变量。 G_{1i} 代表区县(群体)特征, γ_{01} 是群体特征的系数; x_{1ij} 代表个体特征, γ_{10} 是个体特征的系数,代表个体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该模型将因变量解释为个体特征和区县环境特征的函数。 δ_{0j} 代表未被观察到或无法观察到的区县层次的随机变量,该变量为同一区县内所有流动人口个体所共有(杨菊华, 2012)。

无条件平均模型的分析结果(限于篇幅,这里没有展示)表明,地区层次因素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不容忽视,需要使用多层模型技术进行分析。

2. “主要与本地人交往”的多层 logistic 模型分析结果

表2 北京市流动人口行为适应(主要与本地人交往)多层 Logistic 模型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流动特征				
青年流动人口	-0.13	0.11		
乡-城流动人口	-0.37	0.11***		
年龄+户籍				
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对照组)				
青年城-城流动人口	-	-	0.14	0.13
年长城-城流动人口	-	-	0.35	0.17*
年长乡-城流动人口	-	-	0.40	0.15**
在北京居留时间(<=1年=对照组)				
2-3年	0.12	0.15	0.10	0.15
4-5年	0.38	0.15**	0.35	0.15*
6-10年	0.47	0.15***	0.45	0.15**
11年及以上	0.66	0.15***	0.62	0.15***
本地人有偏见	-0.37	0.09***	-0.37	0.09***
融入意愿(不想融入=对照组)				
意愿不强	0.57	0.24*	0.55	0.24*
意愿强烈	0.85	0.24***	0.83	0.24***
人口经济特征				
男性	-0.21	0.09*	-0.19	0.09*
在婚	-0.11	0.12	-0.15	0.12
受教育程度(<=小学=对照组)				
初中	0.16	0.17	0.15	0.17
高中	0.60	0.18***	0.52	0.19**
大专+	0.86	0.20***	0.64	0.21***
干部专业人员及办事人员	-0.07	0.14	-0.07	0.14
就业身份				
雇主(对照组)				
自营劳动者	-0.24	0.19	-0.17	0.19
家庭帮工	-0.86	0.44*	-0.80	0.44
雇员	-0.46	0.19*	-0.37	0.19
不在业	-0.45	0.24	-0.41	0.25
单位性质(个体=对照组)				
私营	0.08	0.15	0.08	0.15
其他	0.32	0.16	0.35	0.17*
国营等	0.63	0.17***	0.63	0.17***
居住条件	0.01	0.00***	0.01	0.00***
截距	-2.12	0.39***	-2.96	0.38***
样本量及随机参数				
Sd(cons)	0.54	0.13	0.54	0.13
sd(Residual)				
Wa土d chi2	266.08		266.05	

注:个体样本量=4000;区县样本量=13;*p<0.05;**p<0.01;***p<0.001。

表2 陈列了北京市流动人口“主要与本地人交往”的两个多层 logistic 模型分析结果;在模型1中,年龄和户籍身份分别为独立变量,模型2 则使用二者的互动变量,前者将得到各自与因变量的关系,但这样未能考察北京市青年乡-城、青年城-城、年长乡-城、年长城-城流动人口之间的异同,故模型使用互动变量(下面的“社区参与因子”采用了同样方法)。多层模型中的系数解释与常规模型的解释是一样的。比如,模型1 为二元 logistic 多层模型,以流动人口年龄队列变量为例,青年流动人口对应的系数为-0.13,表明他们主要与本地人交往的概率是年长流动人口的 $e^{-0.13}$ 倍(约为0.88),即主要与本地人交往的概率比后者低12%。表3 中的模型3 为多层线性模型,青年流动人口对应的系数为-2.43,表明他们社区参与因子得分比年长流动人口低2.43分。

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前提下,与年长流动人口和城-城流动人口相比,青年流动人口和乡-城流动人口主要与本地人交往的概率较低,虽然年龄之间的差别并不显著。显然,该发现并未完全证实前面提出的理论假设1和假设2,青年流动人口与本地人交往的程度并未超过年长流动人口,而是恰恰相反。我们将在后面的定性分析中,探寻其影响机制。

与流动有关的变量都与该因变量显著相关。与预期一致,总体来说,在北京居留的时间越长,流动人口越可能主要与本地人交往;对在北京居留了11年以上的流动人口而言,主要交往对象为本地人的概率是居留时间不到1年者的2倍(= $\exp^{0.66}$)。反之,若流动人口感到本地人心存偏见或歧视,会阻碍他们与本地人之间的交往。显然,流动人口若有强烈的融入意愿,则会大大且显著地提高他们与本地人交往的概率。当在模型中纳入年龄和户籍的互动变量后,青年乡-城流动人口与本地人交往的概率显著低于其他所有人群,尤其是两类年长人群。

3. “社区参与因子”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结果

从模型1和模型2可知,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情况的确因年龄和户籍身份而不同。他们的社区参与是否也呈现类似特点呢?下面利用多层线性模型进行分析(见表3)。

表3 北京市流动人口行为适应(社区参与因子)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3		模型4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流动特征				
青年流动人口	-2.43	1.11*	—	—
乡-城流动人口	0.76	1.30	—	—
年龄+户籍				
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对照组)				
青年城-城流动人口	—	—	1.86	1.20
年长城-城流动人口	—	—	-2.45	1.89
年长乡-城流动人口	—	—	2.06	1.61
在北京居留时间(<=1年=对照组)				
2-3年	2.64	1.22*	2.69	1.22
4-5年	4.98	1.26***	5.00	1.26***
6-10年	5.31	1.32***	5.29	1.32***
11年及以上	7.72	1.32***	7.75	1.32***
本地人有偏见	-1.08	0.90	-1.08	0.90
融入意愿(不想融入=对照组)				
意愿不强	-1.14	1.67	-1.17	1.67

续表3

变量	模型3		模型4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意愿强烈	5.51	1.68***	5.49	1.68***
主要交往对象为本地人	3.10	1.15**	3.10	1.15**
人口经济特征				
男性	-0.75	0.92	-0.82	0.92
在婚	-0.33	1.28	-0.48	1.28
受教育程度(<=小学=对照组)				
初中	5.35	1.40***	5.23	1.41***
高中	8.40	1.57***	8.24	1.58***
大专+	7.65	1.87***	7.55	1.88***
干部专业人员及办事人员	-1.27	1.23	-1.28	1.23
就业身份				
雇主(对照组)				
自营劳动者	-4.37	1.83*	-4.34	1.83*
家庭帮工	-6.11	3.36	-6.10	3.36
雇员	-5.58	1.87**	-5.59	1.87**
不在业	-4.14	2.36	-4.23	2.37
单位性质(个体=对照组)				
私营	0.43	1.29	2.91	1.45*
其他	-1.87	1.47	-0.09	1.67
国营等	3.82	1.54*	5.12	1.74***
居住条件	0.07	0.01***	0.07	0.01***
截距	12.80	5.63**	11.54	5.49**
样本量及随机参数				
sd(_cohs)	16.32	3.25	16.32	3.25
sd(Residual)	24.13	0.27	24.12	0.27
Wald chi2	288.50		289.50	

注:个体样本量=4000;区县样本量=13;*p<0.05;**p<0.01;***p<0.001。

显然,青年流动人口的社区参与程度显著低于年长流动的人口,而乡-城流动人口的参与程度不显著地超过城-城流动人口(模型3)。这样的结果同样也与预期的不同。年龄和户籍身份的互动变量(模型4)却表明,这4个群体之间并无明显差别。

如同交往对象一样,在北京市的居留时间与社区参与因子得分的关系几乎是线性的:随着时间的延长,社区参与因子得分随之提高,且几乎都高度显著:比如,对于居留时间超过10年的流动人口,其社区参与因子得分高出居留时间不到1年者近8分。同样,若流动人口具有强烈的融入意愿,社区活动参与程度就会显著提高;若流动人口的主要交往对象为本地人,他们也会更多地参与社区活动。

在这4个模型中,控制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都比较一致。就人口经济特征而言,女性比男性、不在婚者比在婚更可能主要与本地人交往,也更多地参与社区活动,但仅有与本地人交往的性别差异是明显的。受教育程度与这两个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基本一致:主要与本地人交往、社区参与程度

均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提高,表明教育水平不仅成为流动人口获取不同职业地位的阶梯,也成为扩展社会网络的有力手段(赖晓飞,2009),助其社会网络从传统的以血缘、地缘关系为核心向现代的以业缘为核心转变,对流动人口融入当地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职业类型、就业身份是个体经济经济地位的重要标志,但很有意思的是,较高职业地位之人的行为适应反而不如较低地位之人,尽管与因变量的关系并不显著。作为雇主的流动人口与本地人交往的概率和社区参与程度高于自营劳动者、家庭帮工、雇员以及不在业的流动人口。其中,在交往方面,雇主相对于家庭帮工和雇员的优势更为显著;在参与方面,雇主对于雇员和自营劳动者的优势更为明显。流动人口的就业单位也与其行为适应有关,在国营单位工作的流动人口,不论是主要与本地人交往的概率,还是社区参与因子得分都显著高于个体户,显著提升流动人口的行为参与度。最后,流动人口的居住条件也与其行为适应有关,居住条件越好,则他们更可能与本地人交往,也更愿意参与流入地的社会活动。

五、定性访谈分析结果

本节针对前面的定量分析结果,利用深度访谈资料,挖掘影响北京市青年流动人口人际交往和社区参与的潜在机制。调查于2012年1-5月在北京市朝阳区、海淀区和大兴区3地进行,受访人群包括不同年龄和户籍流动人口以及北京本地市民。

(一) 人际交往

流动人口的人际交往分为两个阶段:在生存阶段,主要是围绕血缘、地缘等同质关系构成的强关系,而信任是这一交往的基础和纽带;在发展阶段,除利用已有的同质性关系外,还利用具有异质成分和制度因素的弱关系,参与社会活动、与人沟通交流(柯兰君、李汉林,2001)。对北京市流动人口的深度访谈结果证实,青年流动人口的人际关系多仍是以血缘、亲缘、地缘为主的初级关系网络;除家人亲戚外,能够深度交流的多只有老乡,难以与本地人进行交流、沟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一位在北京市居住了3年的年轻保姆说:

我初中毕业就到北京给一个老乡看小孩,整天围着小孩转,哪有时间或机会跟北京人交往呀?就是有时候跟院子里其他保姆一起聊聊天吧。再说,就是我想跟北京人交往,还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呢?(那总有点休息时间吧?)休息时间就是跟其他老乡聊聊天或出去逛街;刚来的时候,去长城、天安门玩过。

显然,这位保姆很少与本地人交往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工作时间长,很少有闲暇时间和机会与雇主以外之人交往和交流,二是不知道北京人是否愿意与自己交往。这种说法很有代表性,其他受访者也给出类似原因。

与年长流动人口相比,青年流动人口收入较低,加班更多,工作压力更大。北京一位27岁的来自湖南娄底的打印店店员这样说:

都是一直在这个店里面,做这个不赚钱,早上8点,现在的话晚上也做到8点,到外面玩一会没事,不能时间太长,没有时间,不接触,有时间在家睡睡觉,很少有时间做别的,反正天天上班嘛,闲了就想睡睡觉,反正就是不想动了。

还有一位来自河北农村的小伙子,29岁,在北京做装修工,他在接受访谈时说:

没时间(和北京本地人)交流,……有了小孩儿以后,花销大,北京消费高,我们经济上感觉真是不宽裕,得拼命挣钱,从早到晚干一天,挺累的,是呗,回去就休息了,基本上天天这么着,

有时间最多和老乡打打牌什么的,过年过节的就回家了,平时不怎么特别地接触。

由此可见,进入北京的青年流动人口为工作和生计奔波;刚有孩子之人更要为养育年幼子女付出更多的心血和汗水,没有时间和精力与本地人多交往。同时,对年长流动人口的访谈发现,虽然年长流动人口也反映收入不高、工作时间长,但是与青年流动人口相比,他们的收入较高,经常加班的情况较少,且有一定的积蓄,加上子女较为年长,经济、时间和精力方面都略微宽裕;此外,他们在北京生活的时间相对较长,与本地人交往的社会网络得到扩展,故而与本地人的交往面超过青年流动人口。前面的定量分析结果显示,青年流动人口的行为适应程度低于年长流动人口的结果,与基于现存研究而提出的理论假设不甚一致,而对定性访谈材料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解读这种不一致性。

影响青年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交往的第二点原因是,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之间的信任感不强,而这在青年乡-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之间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一位在北京给人看服装店的安徽籍姑娘(20岁)认为:

本地人就是稍微势利一点吧,高傲,外面的因为大家都是在一个起跑线嘛,然后都互相关照一下嘛。会感觉人家(本地人)高高在上,你要和人交流,人家还摆出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呢。经常会遇到这种。也有挺好说话的,但是我感觉挺好说话的大部分都不是北京的,和本地人只淡淡地交往一下,不是一类人,我在我的世界里面,他们在他们的世界里面。

同样,从对北京本地市民的访谈中可以明显发现,与青年流动人口相比,北京本地人对青年流动人口的信任度低于对年长流动人口的信任度。一位本地中年妇女这样评价外来的年轻人:

信任?……不会完全信任,住在旁边,来了也没多长时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走了,也不了解,不要紧的事,没准儿行;要紧点的事,那可不行。还是老街坊老邻居(能信任)。外地人,如果真在北京扎根了,接触的时间长了,特了解了,也能信任,嗯,有这样的。

与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相比,青年城-城流动人口适应能力较强,对北京有更强的认同意愿,在北京发展了自己的业缘和友缘关系,与本地市民来往得比较多。比如,一位在北京做联通营业员的四川小伙子就认为,他与北京本地人交往很好:

朋友本地的外地的都有,本地的还是居多,对,我感觉本地人、北京人挺好说话的,直爽啊,北方人,有什么说什么,交流沟通没什么困难,关系挺好的,北京人对外边的人没有偏见,我感觉比XX(我国另一大城市)好多了,XX人特别排斥。

从血缘、亲缘、地缘到业缘、友缘的过渡,其实反映了流动人口社会网络的发展过程,即从初级且高度同质的生存型的社会网络向生存与发展并重型的多层次社会网络发展,经营融入的人情资本,在维持或淡化强关系的同时,打造弱关系,以获得融入流入地所必须的社会支持。我们在访谈中反复感受到,若青年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认同度比较高,愿意融入当地并成为其中的一员,而且比较喜欢居住地,他们就会主动地接触当地人,参与社区活动。当然,融入是一个过程,随着他们在流入地居留时间延长,对流入地的认识加深,与当地人增进互信、产生共识,这样就可能打破群体之间的隔阂,促进两个人群的交往。

人际交往、交流和沟通是促进不同人群之间互相认同、彼此融入的重要桥梁和关键纽带。若两类人群之间根本不熟悉、不了解,日常生活中没有交往,迎来送往中没有交流,心理情感中没有沟通,他们不会融合到一起。只有在聊天休闲时不断增加接触,在日常工作中不断增强合作,在礼尚

往来中不断增进感情,才能真正提高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的社会融合程度。可见,要想促进两类人群的融合,人际交往是必不可少的纽带。

(二) 社区参与

社区活动是流动人口熟悉、了解流入地的生活习惯、风土民情、进而促进行为适应的重要手段。但是,定量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社区活动参与率很低,社区文体活动、公益活动、参与选举的比例大约分别为34%、45%、14%,参与因子得分仅为29分,青年流动人口的参与因子得分更是明显低于年长流动人口。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访谈资料为我们提供了如下解释。

其一,与交往的情况相似,青年流动人口忙于工作和家务,无暇参加各类社区活动。尽管一部分青年流动人口乐意参加各种社区活动,愿意增多与他人、与本地市民的接触、交往机会,在首都北京,这方面的资源非常丰富,但往往忙于工作、生意或家庭事务而没有多余时间参加活动。例如,北京一位外来的30出头的杂货店女店主说:

社区活动挺多的,唱歌跳舞啊,有打球比赛,有奖东西吧,我们住得远,白天过来,晚上回去,回家就很晚了,睡觉了,哪有时间去玩那些啊。如果不忙,我可能会去。

北京本地市民的说法印证了这种情况,一位已经退休的本地妇女说:

我们社区活动多着呢,我们是经常参加,都是本地人,几乎没有外地人,其实这片儿有好多地租的租房的,我也认识几个,都是年轻的,唉,是挺辛苦,有做小生意的,有上班的,早出晚归,得挣钱啊,要不怎么养活自己,没时间参加活动,有的还跟我说羡慕我们,说要是有时间也来跟我们一起,可也没见着啊,我们现在退休了,他们不行,他想参加,但是他条件不允许呀。

与青年流动人口反映的情况有所不同,两位40多岁的流动人口在访谈中都表示,北京的社区活动比较丰富,她们还是能够有一些时间参加社区活动的。可见对于年长流动人口来说,他们工作和家庭生活都比较稳定,参与社区活动的情况较好一些。其二,青年流动人口对北京市的各类社区活动和文化资源缺乏了解。一个男性保安在被问及“了解有哪些自己可以去参加的文化活动”时这样说:

这个我不太清楚,你说的社区活动是不是说献血啊、捐款啊什么的?献血献过一次。其它的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其它的?平常了解不到(这方面的信息)。

这样的情况在北京的青年流动人口当中并不少见,这是青年流动人口社区参与程度较低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对年长流动人口的访谈则发现,他们对北京各方面的了解更多,自然也包括文化资源和社区活动方面,这与年长流动人口在北京生活的时间相对较长有关,也与年长流动人口阅历相对丰富、比年轻人更懂得珍惜和体会生活有关;同时,年长流动人口更为广泛的本地社会网络,对其参与本地的社区活动、了解本地的文化资源也有很大的帮助。

其三,一些社区活动没有实际效果和效能,对青年流动人口没有吸引力。有些青年流动人口确实不愿意参加当地社区组织的各种活动,认为这些活动是走形式,对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没有实际帮助。一位老家在河南农村的上班族(25岁)如是说:

出来以后去过别的地方打工,北京的(社区活动)搞得是好一点,毕竟是首都啊,可是我也没去,工作忙,再说有的活动就是没什么实际意义,做一些表面文章,一阵子就过去了,对我也

没什么好处,干啥?……刚生了小孩,没有我们需要的活动,比方说,它要是有一些对孩子有好处的活动,我也许愿意参加,可是好像也没听说有。

在访谈中,我们还了解到,虽然社区组织的各种文体活动、娱乐活动、公益活动、宣传活动既能强身健体,也能促进青年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的广泛交流与沟通,推动他们的社会融入,但在组织社区活动时,对青年流动人口的实际情况考虑不足。比如,大部分活动在上班时间内进行,青年流动人口根本无暇顾及;又如,一些社区活动往往是为开展活动而开展活动,并不是真正从青年流动人口的利益出发,故而多流于形式,是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虽然敲锣打鼓,热热闹闹,气势宏伟,声势浩大,但对参与人员毫无用处。青年流动人口较低的行为适应程度,反过来进一步减少了他们与北京本地人的交往和交流,难以建立起互信、互助的融洽关系,从而不利于青年流动人口对北京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

其四,经济社会特征对不同年龄的流动人口行为适应也有重要影响。不同的职业交往对象的层次不同,社会资本积累的广度和深度也有较大差异(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10)。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许多青年流动人口工作不稳定,难与本地市民建立长久的联系,从而对他们的行为适应和心理融合产生不利影响。就劳动就业特征而言,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由于自身发展潜能不足(如:受教育程度、专业技能较低),加上制度性的藩篱,多集中在声望较低、社会流动空间较小、本地人很少的职业中,故很难接触到本地市民。同时,较高的职业隔离和行业聚集把流动人口和本地市民区分为两个世界,致使居住隔离,形成二元“社区”,阻隔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的交往,强化了其社会网络的同质性。收入也会影响行为适应(包括社会网络的构建),较高的收入提高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交往的自信心和实力,削弱与本地人交往的物质和心理阻力和障碍。社会保障、居住条件等都可能作用于流动人口的行为适应,拥有更好的保障和居住条件,可能增强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认同,也使其更多地参与社会文化活动。

六、总结、讨论与政策思考

进入北京市的青年流动人口不仅需要找到工作和住所,而且也需要逐渐适应流入地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以便更好地工作、生存和发展;实际上,从流入之日起,他们就开始了漫长的适应之旅。学习城市的生活方式和进行广泛的社会交往是流动人口融入流入地生活的关键环节。生活方式不是纯粹个人生活的形式与特点,而是具有鲜明的群体性,且经济条件对生活方式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城市与农村的生活方式各不相同,各地区人群的生活方式也有差别。流动人口从农村到城市、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通过与流入地之人、文化、环境的互动,其生活方式自然而然随之发生变化,向流入地的生活方式靠拢是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再社会化。在这个再社会化的过程中,流动人口适应流入地的生活、并融入到流入地社会。

本文利用定量和定性数据,通过对人际交往、社区参与和闲暇活动等指标的分析后发现,北京市青年流动人口的行为适应程度很低,主要表现在很少与本地人交往,极少参与社区活动。即便控制了在北京的居留时间,他们主要与本地人交往的概率、社区参与程度都低于年长流动人口;若同时考虑年龄和户籍,则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行为适应处于双重弱势,与本地人交往的概率显著低于城-城、乡-城年长流动人口,社区参与程度低于年长乡-城和青年城-城流动人口。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和多个朝代的首府,北京有着深厚的物质、精神、政治、文化积淀及十分丰富的资源;同时,与许多有着浓厚方言之地不同,进入北京的流动人口可顺利地与本地市民进行互动交流。虽然如此,这里的青年流动人口并未表现出较好的行为适应,尤其是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对定性数据的分析告诉了我们适应程度较低背后的故事。基于分析结果,我们提出以下思考和建议:

其一,真正落实青年流动人口的劳动保障,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降低他们平均劳动时间,使他们有时间、有机会与北京本地市民进行交往、沟通、交流、互动。流动人口的劳动时间很长,即便他

们愿意与本地人交往,但也没有时间交往。他们之所以主动、甚至争取加班,主要是因为其劳动力过于廉价。尽管廉价劳动力在哪里都有,但流动人口的存在更是突破了廉价的底线,他们的工资远远低于城市工人。因此,加班看似自己的选择,但其实是为了维持在城市的基本生存、适应城市生活高消费的被动行为;或者只要对生活有更高一点点的追求,他们就不得不过度劳动。主动的背后是强迫性的,制度性和结构性制约将他们推到很难摆脱的生存困境;工作 11 小时和 8 小时是完全不同的,把人的精力、体力都推到疲劳的极限,不可能有机会与本地人交往、融入到流入地生活中。

其二,有效促进各类信息的交流,引领青年流动人口更好地适应北京市的社会生活。作为首都,北京市丰富的各类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社会活动一直是吸引流动人口、特别是青年流动人口之处。但分析结果却表明,流动人口不仅未能充分享受这些资源,而且除了一些著名景点外,他们对许多活动实际上并不了解(比如:许多青年流动人口并不知道博物馆以及其他社会活动免费开放信息);同时,除了一些特大事件和献血等活动外,他们对其他公益活动亦不知晓,也不知道如何参与。因此,如何促进文化信息和公益活动信息的有效传播应该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并特别注意活动开展的时间,既让青年流动人口有机会了解他们的生活环境,也多给他们展示自身能力并与本地人交流、对话的机会。

其三,大力加强社区建设和宣传活动,开展多种形式的社区活动,将社区打造成为北京本地人与外来人口融合的平台,鼓励青年流动人口充分参与其中,积极融入社区生活。比如,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针对年轻人的爱好和特点,开展多样化的社会活动,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和业余生活。社区也需要主动地为流动人口提供服务,提供娱乐休闲设施,这样可以增强流动人口对其所居住社区的心理认同和归属感,从而促进流动人口与社区居民的交流与融合。通过社区的小融合,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大融合。当然,开展活动不能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或收获政绩,而是要真正服务于流动人口的需求。

其四,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减弱并逐渐消除北京本地市民对(乡-城)流动人口的偏见和歧视。正视(乡-城)流动人口与北京市民之间在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教育北京本地市民与流动人口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将北京精神中“包容、厚德”的含义不断发扬光大。

青年流动人口的行为适应不仅是个体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仅仅依赖他们自身努力未必能达到行为适应的目的,必须是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使流动人口更好地适应流入地方方方面面的生活。促进流动人口的行为适应需要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更好的平台、心理指导和精神引领,这些都十分重要,从关心到引领,以服务质量提升管理水平。作为一个相对较为包容的社会,北京应该让任何一种身份之人都能享受到首都给大家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机会,也应该在这个过程中,淡化人群之间的身份差别。

参考文献:

- 陈云,2008,《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中的排斥与内卷》,《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期。
- 杜鹏、丁志宏、李兵、周福林,2005,《来京人口的就业、权益保障与社会融合》,《人口研究》第4期。
- 杜鹏、李一男、王澎湖、林伟,2008,《城市“外来蓝领”的就业与社会融合》,《人口学刊》第1期。
- 郭星华、胡文嵩,2006,《闲暇生活与农民工的市民化》,《人口研究》第5期。
- 郭星华、邢朝国,2009,《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中州学刊》第6期。
-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10,《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 蒋美华、王国艳,2009,《农村女性流动人口与城市的社会融合——基于河南省的调查与思考》,《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第3期。
- 金萍,2010,《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群际融合态势分析——基于对武汉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群际关系的滚动调查》,《长江论坛》第5期。
- 柯兰君、李汉林,2001,《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里的流动人口》,中央编译出版社。
- 赖晓飞,2009,《文化资本与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基于厦门市Z工厂的实证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雷敏、张子珩、杨莉,2007,《流动人口的居住状态与社会融合》,《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4期。

- 李立文、余冲,2006,《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适应问题研究》,《中国青年研究》第4期。
- 李树苗、任义科、靳小怡、费尔德曼,2008,《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的分析》,《人口与经济》第2期。
- 李伟东,2009,《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研究》,《北京社会科学》第4期。
- 梁宇,2007,《浅析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及其成因》,《市场论坛》第4期。
- 刘传江、程建林、董延芳,2009,《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
- 孟庆洁、乔观民,2010,《闲暇视角的大城市流动人口生活质量研究》,《城市发展研究》第5期。
- 穆薇、尹华站、王昌善、张希希,2012,《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问题调查及对策——以重庆市新生代农民工为例》,《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钱文荣、张忠明,2006,《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融合度问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期。
- 任娟娟,2012,《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兰州学刊》第3期。
- 王春光,2001,《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第3期。
- ,2010,《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及问题的社会学分析》,《青年探索》第3期。
- 王毅杰、王微,2004,《国内流动农民研究述评》,《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 魏晨,2007,《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研究》,《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2期。
- 吴祁,2010,《流动人口的社区参与研究——基于社会资本角度的考察》,《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5期。
- 杨菊华,2006,《多层模型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 ,2009,《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人口研究》第1期。
- ,2010,《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基于社会融入理论的进一步研究》,《人口与经济》第2期。
- ,2012,《数据管理与模型分析:STATA 软件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杨永、朱春雷,2007,《公民参与视野下的城市农民工——对武汉市农民工的调查与分析》,《唯实》第6期。
- 张文宏、雷开春,2008,《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第5期。
- 左珂、何绍辉,2011,《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中国青年研究》第10期。
- Cohen R. , 1996, *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 Oxford.
- Goldstein, 1995, *Multilevel Statistical Models. 2nd ed.* New York: Halstead Press.
- Lyon L. , 1987, *The Community in Urban Society*. Chicago.
- Portes, Alejandro, 1998,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人口学系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赵联飞